

经济的限度

中国「经济奇迹」与社会正义

汪丁丁◎著

Limitation of Economics

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厘清中国经济本源问题
求解局限在物质生活单一维度里的中国人突围之策



中国计划出版社



博雅天卷
CS-BOOKY

理享家

经济的 限度

汪丁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的限度 / 汪丁丁著. —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82-0663-6

I. ①经… II. ①汪…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2357号

经济的限度

汪丁丁 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jhpress.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11号国宏大厦C座3层

邮政编码: 100038 电话: (010) 63906433 (发行部)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mm × 1092mm 1/16 15 印张 144 千字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82-0663-6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再谈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感谢徐晓和她的编辑团队至少两年来的不懈努力，这本“文选”（选自2010年以来我写的文章）终于出版。我撰写这篇序言时，有机会重温这组文稿，并惊讶地发现它们被编辑重新安排之后简直可说是“焕然一新”。这本新书的序，我认为，最合适的标题是“再谈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我在以往三十多年里写了不少文章探讨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至少两篇以此为主题。其一是2014年我在杭州湖畔居与周濂的长篇对话，另一篇的标题是《复杂思维为何艰难》，也是2014年写的——那一年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界受到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思想冲击。为此，我写了一组文章，收入张进主编的《中国改革》。张进在财新网发表的评论中特别列出他理解的我这组文章的关键词：“中国奇迹”“收入正义”“资本财富”“复杂思维”。读者不难在这本书里找到以这些关键词为标题的文章——《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收入分配与正义诉求》《资本与财富》，以及上述两篇关于复杂性的文章。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密切相关的，是这本书里其他文章的主题，例如我为阿瑟《技术的本质》2014年中译本撰写的序言，在财新网发表时的标题是《锁死的路径》。

又例如《互联与深思》《人类创造性的两大前提》《互替与互补》《竞争与合作》《自由与自律》。逐渐地，读者不难理解这组文章的基本方向，那就是借着探究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经济学理论或许能够超越以往的局限性。例如，这本书里有两篇这样的文章：《美食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核心议题是“稀缺性”——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因为“稀缺”所以“竞争”，或者，当我们观测到“竞争”时，我们可以推断“稀缺”。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或“产权学派”经济学，核心议题是竞争稀缺资源时不可避免要有的各种“歧视”标准的孰优孰劣之分析。于是，经济学关于稀缺与竞争的理论，从个体的理性选择扩展至群体的决策行为。如果群体人数很少，那么，经济学家更愿意运用“博弈论”方法于群体行为。不过，当群体人数众多时，博弈论并不是好用的分析方法。例如，当我们分析中国“转型期”各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时候，由于群体人数众多，群体成员相互之间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成为任何理性选择模型的主导因素。注意，这里出现的是奈特在百年前考察的那种不确定性——特指那些不可重复从而不可预期“事件”，它们当中意义重大的，现在被称为“黑天鹅事件”。这种不确定性无法被假设“信息完备”或“信息完全”的博弈理论容纳，尤其是，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理性选择模型不再可能如以往的博弈分析那样是“逆向推演”的。取而代之的是，例如“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也称为“基于以往经验之间相似性的非贝叶斯决策理论”），又例如来自统计物理学的随机过程分析方法（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里的版本是“动态随机过程一般均衡”方法）。但是经济学家在引入这两种新方法之后，几乎立即意识到伴随新方法的核心议题——“复

杂性”，或任何复杂系统的“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典型的各态历经，就是布朗运动的特征——假以时日，空间内的简单布朗运动可以达到任一位置。可是，复杂系统的特征在于，它以往的演化改变着它现在的结构于是很可能永远无法达到某些位置，所谓“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在这样的“演化社会理论”视角下，如果这些永远无法达到的位置的集合包含着各种被称为“均衡”的状态，那么，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社会演化可能达到另外一些状态，例如“崩溃”或“解体”。

其实，我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问题意识当中始终有上述复杂性的牵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和乘客攀谈，而且喜欢发表政经评论。在以往五年里，我遇到至少三位这样的司机，非常不满意“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化改革。他们的不满，我这样概括：当初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些富起来的人却“为富不仁”（当然还要“官商勾结”）垄断了全部经济资源，致使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我的这一概括，可追溯至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公认的老师奈特在1930年代为学生们讲授微观经济学时的开场白，他提醒学生们，首先，不要以为世界上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其次，完全不受社会制约的自由竞争很可能导致财富积累和权力垄断到完全消灭自由的程度。阿罗是奈特的学生，以“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以及相关的理论贡献而获诺奖。但是我认为诺奖委员会忽视了阿罗的另一个“不可能性定理”，这一定理可以表述为：不可能有包含全部社会系统在内的自由市场。换句话说，只能有嵌入于既定社会之内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有嵌入于市场经济的良序社会。

根据我的上述概括，出租车司机们的不满表现了社会演化的“复杂性”：当初的市场化改革获得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积极响应，由于

市场化改革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逐渐改变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市场化改革的态度，新的态度凸显为公众对最近十几年“反腐败运动”的全面支持（包括使权力集中于领导反腐败运动的核心人物的政治支持），这一集权过程又倾向于成为对改革初期“放权让利”过程的完全反动，甚至，为强化这一集权过程而采取的“意识形态”，逻辑地要求批判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以致最热衷的改革者们不再相信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即承认存在着一些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达到的状态）。

一如既往，我是悲观主义者。在演化社会理论的视角下，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未来从来就是不确定的，并且这种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逻辑地意味着复杂性和“非各态历经”演化特征。我写的这篇“序言”，本质上是这本文选的“升级版”，仅仅为早已读懂了这本文选的读者而写。我的长期读者从来就知道为理解我现在的文章，他们通常必须回溯我以往几十年发表的文章。不如此，就不能“升级”。

目录

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 · 001

大国为何无以师小国 · 007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与周濂对话 · 016

中国转型的可能性及其道路 · 060

正义与人生的中国式思考 · 080

人类创造性的两大前提 · 098

互联与深思 · 102

复杂思维为何艰难 · 122

竞争与合作 · 133

互替与互补 · 140

自由与自律 · 146

“锁死”的路径 · 152

永远的贝克尔 · 157

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生应该读科斯的书 · 166

他刺痛了这个毫无希望的世界 · 170

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 · 174

美食经济学 · 197

经济学的“错置实境”迷途 · 206

收入分配与正义诉求 · 210

资本与财富 · 220

嵌入在社会里的公司——重温德鲁克 · 229

中国奇迹的历史与未来

只要粗略回溯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史，不难看到，可称为“经济奇迹”的，例如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8%且持续20年以上的时期，仅发生于1990年以后。

这里的“近代”，依照常见的一种解释，上溯150年，由2000年上溯，始于“鸦片战争”。近代以来，即涵盖到今天为止的现代或当代。

由于休谟指出的基于发生时间相邻而生成的关于现象 A 与现象 B 之间的因果联想，我们早已习惯于将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视为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从而难以设想存在着只是因难以“量化”而不能获得经济学家承认的其他更深远的原因。

任何一个经济的奇迹（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都不能脱离它嵌入其中的社会。而任何一个社会，总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三个基本的维度。

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候，其实是相对于我们熟悉的大多数不能称为奇迹的社会现象而言。

经典的奇迹发生于耶稣传道时期，记载于《新约》。由于显著不

同于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熟悉的、不被认为是奇迹的现象，耶稣由信仰而来的行为，被当时的民众称为奇迹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科学昌明，凡科学可以解释的，或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可以解释的，不再被视为奇迹。科学，包括经济科学。至今，经济学家仍在试图理解或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

毕竟，这一被称为奇迹的经济增长时期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中国人面对的是未来，是不仅与以往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与以往一百多年乃至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未来，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所引发的重重危机。

第一重危机是精神生活的，特别在中国，表现为文化危机，或借用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人文精神的危机”。其实，精神生活本质上是内在的，是“自足”，或“不外求”。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周代晚期“官学失守”，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求诸于野。至秦汉时期，不论依据台湾的钱穆先生，还是依据大陆的冯友兰先生，人文精神毕竟是止于宋了。宋以后只有“乾嘉诸老”，人文精神“命悬一线”。随后，是唐君毅先生所述的“花果凋零”时期。

第二重危机是社会生活的，特别在中国，核心是情感危机。哺乳动物的情感可分为“原初的”——惧、怒、哀、喜、厌；“派生的”——例如恨、爱、嫉妒；“复合的”——例如又爱又恨、悲喜交集、惆怅莫名。哺乳动物演化至人类，有了更高级的情感，例如道德感、正义感、审慎与悲悯，以及与最高存在相通之感——宗教感或信仰。

是否有单纯指向个人的私己情感？日常生活中，当然有，例如懊恼、悔恨、自恋之类。但深入探究之后，我认为那些表现为私己情感的，归根结底是米德最早论证的每一个人“社会自我”（social self）之反映，我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孤立于社会生活的人（以著名的“狼孩”为案例）怎样产生懊悔、恼恨、自恋这类私己情感。

第三重危机，读者不难推测，是物质生活的。毫无反思能力的经济发展，势必耗竭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生态以及人类自身。可是，对物质生活的任何反思，只能来自物质生活之外，例如精神生活或社会生活。

情感的稳定方式，简称“情感方式”，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生活的。例如，费孝通先生的想象是，乡土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由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以及这些同心圆与其他人的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表现为“远近亲疏”，或“爱有差等”，或更概括地，梁漱溟先生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此处，人之“伦”，从物之“仑”，即繁体字“𠩺”。据我的朋友吴雪君考证，𠩺之大者，谓之太和。和与𠩺，源自音乐的和谐秩序。𠩺乃律之象征，有笛孔之𠩺，箫管之𠩺，琴弦之𠩺……不同𠩺之间的共振共感，谓之𠩺。

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特征之一是乡土的“熟人社会”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千百万陌生人组成的都市——这些都市不再单纯是政治中心，而是基于劳动分工与协调的集聚效应的经济中心。转型期社会的新生活瞬息万变风险骤升，对不熟悉经济学原理的中国人而言似乎毫无秩序可言，至少，难以形成生活的秩序感。

中国并非特例。据统计，日本和韩国在所谓“经济起飞”时期，不仅有经济的“奇迹”，而且自杀率、离婚率、犯罪率等显著高于稳态时期的情感危机或“奇迹”。

转型期社会生活，由于有了许多新的“命”，却尚未来得及形成新的“脉”，所以才有了“转型”之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稳态社会的历史相比，堪称迅速，于是我们有了“迅速转型”之感。

在社会生活的表层，与“乡土中国”共生共长了几乎七十余代人（以孔子世系的代际数目为例）的生活方式，以“现代化”的名义，被迅速摧毁。可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层，即情感生活的层次——我必须首先讨论政治文化变革。

依据王国维先生的想象，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商周之变。且不论是否“莫剧于”，史家承认，商至周的政治文化变迁，核心是神的崇拜转化为祖先崇拜。我同意王国维先生的判断，这一转化意味着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从“天人之际”，逐渐转化为“人伦”。周代确立了伦理本位的封建制度，天下乃成为百家之天下。虽然百家之天下的格局，由秦统一中国而终结。秦以后，汉唐与宋，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秦以前的封建社会相比，就伦理本位而言，没有实质的改变。依据瞿同祖先生，秦汉之际，有过一个关键性的“法家的儒家化”时期。又据何炳棣与李学勤关于秦简整理工作中墨家对秦崛起之贡献，以及法家与墨家的关系的对话，我们知道先秦最重要的法家人物或兵家人物（商鞅、李悝和吴起）与早期儒家有不能忽视的思想关联。百代皆行秦政制，很可能以始于周代的情感方式为基础。

近代以来，传统的情感方式——由内及外地呈现出来，与现代的生活方式——由外及内地产生影响，二者之间冲突日益尖锐。更重要的是，在迅速转型期，现代化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迅速地西方化。洋务运动以来，这一趋势被统称为“西力东渐”。它意味着，西方是强势的而中国是弱势的。强势的新的生活方式，由外及内，由工作、邻里、朋友之间的社会生活逐渐影响到这些领域的情感生活，再深入到每一家庭之内的情感生活，例如亲子之间的情感关系，直到中国人从出生开始便嵌入在新的生活方式之内。

于是，发生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冲突是否将使周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情感方式最终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化而成为西方的？

我有充足理由认为，这是很难想象的前景。甚至对西方人而言，在千年宗教传统对当代情感方式的影响逐渐消解之后，一种很可能形成的趋势是回归到家庭或伦理本位的社会生活。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情感方式很可能是人类情感方式的通例而非特例，只是人类尚未找到与这一情感方式相适应的稳态社会生活。

在“经济发展的限度”这一主题之下，西方人和中国人都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如前述，由于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转型，中国人的反省特别难以发生。借用马尔库塞的描述，中国人生活在单一的维度里，而且不以为“单向度的人”之生活其实不是人的生活。

在这一视角下，所谓“中国经济的奇迹”，可以说是因为人文精神的衰微和社会生活的失序，在近代以来几乎唯一有机会发展经济

的最近几十年里，单向度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充分展开。

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是深层情感方式与表层生活方式的冲突。求解这一问题的路线，如前述，西方不能提供，中国也不能提供。我认为，等待未来可能涌现出的生活方式，是唯一合理的想象。

大国为何无以师小国

这是中国古人实践智慧的一项遗产。“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庄子集释》卷六下《外篇·秋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自1980年代后期至今（尤其李光耀逝世之后），多次被鼓吹推荐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试图成为“大国之师”。其实，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写给中国的咨询报告就已充分注意到大国与小国的发展模式有本质差异。我清楚记得，这份报告的附录，以“钱纳利－仙昆”大国模型这一醒目标题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传阅。

“大国模型”的思想渊源，我认为可追溯至杨格（Allyn Abbott Young, 1876-1929）以及剑桥的“凯恩斯小圈子”晚期的核心人物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 1903-1983）和她的丈夫奥斯特丁（Austin Gossage Robinson, 1897-1993）——1960年主编出版了一套文集，主旨是探讨“大国的发展模式”（*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这套文集收录的是1957年国际经济学会32名参会者在里斯本关于“国家福利与国家规模之间关系”的讨论文章。一位重要的书评作者科尔（晚年定居英国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引述了与会者们的感慨：

“对于这一重要议题，他们发现，找不到任何更早的足以引证的文献”。¹事实上，科尔认为他自己1941年的作品和西蒙斯1948年的著作 *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 都是与会者们可以引证的先期文献。也是在科尔思想的影响下，舒马赫鼓吹“小的就是美的”。

罗宾逊夫人可以说是凯恩斯“耳濡目染”的朋友，她的丈夫奥斯特汀·罗宾逊（在凯恩斯最繁忙的时期承担了《经济杂志》编辑职责）发表于1947年的《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滕茂桐中译本）被认为是超过了哈罗德爵士《凯恩斯传》的最佳传记。罗宾逊夫人当然熟悉凯恩斯为批判斯密经济学而提出的“集结谬论”——一个人美德推广至全局可能导致不利于每一个人的恶果（例如“节俭”这一美德可能导致经济萧条，从而抵消了节俭的初衷）。当她运用这一极富洞见的观念于发展经济学领域时，她意识到，适合于小国的发展策略不能运用于大国。今天，在博弈论视角下，罗宾逊夫人的洞见相当于经济学家早已获得从而遗忘其思想起源的这一常识：当博弈参与者数目足够多时，每一参与者可以假设自己的策略对博弈格局毫无影响——即“小国”的模型。另一方面，当博弈参与者数目很少时——“大国”之谓也，没有参与者可以假设自己的策略对博

1 Leopold Kohr, 1961, "Book review: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by Austin Robinson",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 no.1, pp.78-81。关于科尔推动的这一思潮，读者还可参阅 Leopold Kohr, 1941, "Disunion Now: A Plea for a Society Based upon Small Autonomous Unit", *American Weekly Magazine*, reprinted as, "Leopold Kohr on the Desirable Scale of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8, no.4 (December 1992), pp. 745-750; 以及他1957年发表的引发了更多争议的著作 "The Breakdown of Nations"。